

无界对话·李静主持

文学之“用”：书写作为对抗黑暗之光

陈世骧先生 1948 年写下《文学作为对抗黑暗之光》。这个题目放在今天来看,依然有一种逼人的力量。若把“文学”放入更广阔的书写实践中,它提出的其实是极为当下的问题,在精神困顿不断显影的巨变时刻,书写还能做什么?文学当然不能直接消除苦难,也不能替代医学、心理学或社会制度的工作,但它或许能够做另一种工作:保存那些尚未被充分言说的经验,使具体的人不至于过早消失在概念和结论之中。

梁鸿的非虚构作品《要有光》正是在此意义上展开的写作。它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中心,写孩子,也写父母;写学校、咨询室和精神科,也写家庭内部那些无法轻易说出口的沉默。如今,焦虑、抑郁、创伤、诊断和治疗已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,相关问题并不缺少医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或新闻报道层面的解释。梁鸿的写作却提醒我们,精神痛苦并不只是一个等待解释和干预的问题,也是一种需要被倾听、被叙述、被慢慢理解的生命经验。

本栏邀请青年学者田森访谈梁鸿,围绕《要有光》以及非虚构写作经验展开,内容非常丰富,涉及采访方法、叙事结构、真实伦理、“光”与启蒙,以及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发展等问题。从全球非虚构传统来看,梁鸿的写作也可以与《巴黎评论》“非虚构艺术”访谈所呈现的问题形成对话,共同说明非虚构写作不是现实的透明记录,而是一种带有选择、判断和道德风险的文学实践。梁鸿的现场常常不是新闻事件的现场,而是中国家庭和日常生活内部缓慢展开的现场。

《要有光》的题名还自然引出“光”与“启蒙”的问题。鲁迅所谓“肩住了黑暗的闸门”^①,写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承担重压、为后来者开路的姿态;陈世骧的“文学作为抵抗黑暗之光”,则强调文学在幽暗时代保存感受与精神可能的力量。梁鸿的“光”与这两种传统均有呼应,却也发生了当代转化,更多指向不同生命之间的彼此启发。这一理解弱化了启蒙话语中的等级姿态,但也留下新的问题,即在非虚构写作中,作家仍然拥有选择材料、安排结构和解释人物的权力。如何既避免居高临下的启蒙,又不回避书写本身包含的权力关系,这正是值得继续追问之处。

总之,这场访谈并非只是关于《要有光》的一次创作回顾。它更希望借由梁鸿的经验,讨论当代非虚构如何在真实、他者、形式与伦理之间展开自身的工作。文学若要进入精神之苦,靠的并不是更快的判断,而是愿意在他人的生活中停留。书写要做的,正是把那些容易被诊断、新闻和公共议题迅速带走的部分,重新放回到具体的人身上,放回到他们的时间、声音和处境之中。也只有在这里,所谓光亮才不再是从外部给出的答案,而是黑暗经验被细致辨认之后,仍然可能显现出的生命力量。

^① 鲁迅: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,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,第 135 页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。